

四川省中等师范学校试用课本

写作知识与作品分析

(上册)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省中等师范学校试用课本

写作知识与作品分析

(上册)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

写作

目 录

第一章 文风..... (1)

第二章 主题、题材、结构..... (22)

第三章 叙述、描写、议论、抒情..... ()

第四章 新闻..... ()

中阮我军占领南阳..... ()

刘胡兰慷慨就义..... ()

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 (105)

第五章 通讯..... (108)

纵情欢呼啊，我们党又有了

自己的领袖..... (123)

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

——铁人王进喜..... (137)

谁是最可爱的人..... (172)

生命线..... (194)

第六章 三史..... (210)

一块银元..... (228)

剥削有罪，罪该万死..... (240)

第七章 调查报告与工作总结..... (250)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262)
木口村调查·····	(272)
请读两篇好而短的调查报告·····	(280)
第八章 政论文 ·····	(298)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307)
反对党八股·····	(340)
改造我们的学习·····	(358)

第一章 文 风

文风，即写文章、讲话的作风。一个人的思想作风，往往从他的文章中反映出来。文风，是一个人的世界观、思想作风、政治品质的具体表现。文章是宣传工具，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因此，文风不可避免地也就打上阶级的烙印。不同阶级、不同路线有着截然不同的文风。文风既为一定的阶级所决定，又为一定的阶级和政治路线服务。

一、文风问题的重要性

文风问题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语言文字问题，而是学风问题，党风问题，是同党的作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也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得到正确宣传，关系到革命精神获得发扬还是受到窒息，关系到党的革命事业能否向前推进。

无产阶级革命文风，有助于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革命事业胜利前进。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文风则是危害革命事业，破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的严重障碍。所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不重视文风问题。

一九三八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曾专门就宣传的民族化问题作了决议。毛主席在会上作的《中国共产党

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特别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期间，毛主席为我党规定了整风的三大任务：“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里明确规定了整顿文风是整顿党风的重要内容之一。毛主席在这次整风中明确地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

（毛主席：《整顿党的作风》）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亡传工具和表现形式，不打倒党八股，就不能彻底打倒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当时毛主席就尖锐地、鲜明地讲明了批判王明一类骗子反动腐朽文风的重要意义。他说：

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巳，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实，尚未得到普遍的发巳。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巳，党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797—798页）

在这里，毛主席把文风的重要性讲得再清楚不过了。马克思主义文风可以推进党的革命事业，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风则妨害党的事业。同时，这段话里，毛主席还教导我们，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风，无产阶级必须鉴别清楚，区别对待。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风，它可以

推进党的革命事业，我们应该大力提倡，使之获得普遍的发巳；党八股是一种资产阶级文风，它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应该彻底加以反对。毛主席还指出：无产阶级文风是在批判资产阶级腐朽文风的斗争中充实和发巳起来的。由此可见，文风问题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单纯的语言表达或文字技巧的范围，它总是和一定阶级、一定的政治路线紧密联系着的。粉碎“四人邦”以后不久，华主席及时指出“要把被‘四人邦’糟踏破坏的我们党的优良学风和文风恢复起来”。

刘少奇、林彪、“四人邦”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腐朽文风，集中表现为他们的党八股、邦八股。其具体表现为：套话连篇，又臭又长；专横武断，耗子乱飞；隐晦曲折，含沙射影；弄虚作假，欺骗群众；千篇一律，百目可憎……这些东西是束缚革命人民战斗精神的桎梏，是窒息革命人民思想发巳的毒剂。因此，对他们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资产阶级文风，必须加以清除。不然的话，他们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及为这条路线服务的反动唯心主义哲学就还有一个生根的地方，一有机会，又会钻出来作怪：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今后，随着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深入和发巳，两种文风的斗争将不断进行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文风，扫荡党八股、邦八股的斗争也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

二、无产阶级革命文风的特点

“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巳，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

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那末，这种文风有哪些最基本的特点呢？毛主席在一九四八年发表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全国解放后，毛主席又多次强调我们写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毛主席还具体地说明：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章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

毛主席这些指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风最全面、最科学的概括，是对文章从内容到形式的总的要求。它具体地指出了许多文章在文风上存在的要害问题，同时也指明了认真改进文风的根本方向。毛主席倡导的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文风，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朝气蓬勃的战斗作风和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

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体现在具体文章里，三者又是紧密地联系着的，不能也不应将它们机械地分割开来。但它们又各有区别，它们分别代表着三个方面的要求，各有其特殊的含义。

（1）准确性

所谓准确性，从内容上说，就是能按照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符合客观实际地反映现实；从语言运用上说，就是文章的遣词造句，能够准确地表达思想。准确性是写一切

文章的最起码的要求，缺乏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就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讲，准确性是鲜明性、生动性的基础。怎样才能使文章尽可能准确？首先要准确地认识客观事物。作者在现实生活中，必须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武器，深入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对客观事物进行周密细致的、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掌握确实可借的材料，并对它进行科学的分析，从而作出正确的论断。然后，在此基础上，把自己的分析和论断用恰当的文字形式表现出来。能不能表达得准确，除了决定于作者对客观事物认识是否正确、深刻而外，另一方面，表达的过程也是促使认识更深刻、更明确的过程。比如有些想法原来是比较模糊的，但由于在表达过程中不断地调查研究、思考，往往会变得更加明确、深刻。我们只有努力做到概念明确，判断恰当，推理正确，并用贴切的语言准确地表达自己所用的概念，所作的判断和推理，才能使文章通顺而又恰当地表达思想。为此，我们必须学点逻辑知识，学一定的语法知识。王明等人的党八股和“四人邦”的邦八股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幌子满天飞。他们的文章故意混淆黑白、颠倒是非，安心把人的思想搞乱，毫无实事求是之忌，毫无准确性可言，革命人民总是嗤之以鼻。

（2）鲜明性

“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所以，无产阶级文风的又一特点是鲜明性。文章的鲜明性，表现在文章的内容上，就是所提的问题鲜明，所作的分析鲜明，所作的结论鲜明。无产阶级文风则有此特色，因为它立场坚定，态度鲜

明，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毫不含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以解放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为己任，相仪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巳的总趋势和前进规律的，因此态度是光明正大的，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四人邦”则不然，他们一心想复辟资本主义，一忌要倒行逆施，而这些都是违反人民忌愿，见不得人的，因此他们的文章总是故弄玄虚，隐晦曲折，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

（3）生动性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一文中作了深刻的指示：“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恡，没味刃，不起劲。”文章的生动性首先来自重大的主题和生动的题材。如果说文章中提出的问題不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重大问题，不是读者普遍关心、急待解决的问题，自然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生动性也就无从谈起。不能认为文章的生动性只是写作技巧上的问题，因而片百追求形式优美，辞藻华丽。那种缺乏真切生动的内容的文章，言之无物，达不到生动恡人的目的。

其次，文章的形式和表现方法对文章的生动性关系也很大。比如篇章结构上的精心布局，把文章写得有波澜，有曲折，有收有纵，有起有伏，也可以收到生动恡人的效果。从表现方法上说，如注忌行文的形象化，以及多辞手法的运用，都会给人生动活泼之恡，其效果与毫无文采的作品大不相同。从语言方百说，如注忌群众语言的运用，句式的安排，词语的推敲、选择等等，也是构成文章生动性的重要条件。

另外，文章的生动性也与无产阶级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有密切关系，它是无产阶级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的自然流露。

总之，文章的准确、鲜明、生动，三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立体。准确是前提，是基础，离开它，鲜明、生动就无从谈起，就会走向歧途。但缺乏鲜明、生动，文章也会失之平板和枯燥。因此，为了增强文章的表现力，说服力，感染力，必须在三者的结合上用气力，从而充分显示无产阶级文风的战斗特色，更好地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服务。

三、打倒邦八股

文风问题，是同一定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的。

“四人邦”在政治上阴谋篡党夺权，组织上结帮营私，思想上大搞唯心论、形而上学，在文风上就表现为邦八股。邦八股是为“四人邦”制造反革命舆论服务的。它流毒甚广，影响极坏。对邦八股加以打扫，加以肃清，把我们的文风切实整顿一番，很有必要。

邦八股有些什么表现呢？

（一）又臭又长，套话连篇。“四人邦”拼命堆砌马克思主义词句，生拉硬扯，生搬硬套，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他们的文章穿靴戴帽，越拉越长，套话连篇，几口也咬不出馅儿来。

（二）专横武断，帽子乱飞。“四人邦”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从来不对客观事物作调查研究，不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而借主观臆断过日子。他们专爱说绝对

的话，用夸张的形容词，下极端的结论。他们的文章充满着形形色色的幌子，无限上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三）隐晦曲折，含沙射影。“四人邦”手中没有真理，心里满怀鬼胎。借古讽今，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施放暗箭，就成了他们的一个“绝招”。一段时间内，在他们把持的报刊上充斥着议宰相、批大伙、论辨帅、评洋务派之类的文章。孔老二就象打麻将中的“听用”一样，随时待命，听候分配任务。这些黑文既要把毒汁喷射出来，又不能说得过于露骨，就只好转弯抹角，吞吞吐吐。

（四）弄虚作假，欺骗群众。“四人邦”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可以随心所欲，篡改历史；可以无中生有，炮制典型；可以颠倒是非，强奸民忌；可以涂脂抹粉，美化自己；可以移花接木，嫁祸于人；还可以制造谣言，贼喊捉贼。总之，他们是搞阴谋诡计的行家，也是在报刊弄虚作假、造谣惑众的骗子手。

（五）千篇一律，百目可憎。“四人邦”所控制所影响的报刊，大都是一付百孔，如同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看报看题，看书看皮”，就是群众对那种千篇一律，枯燥乏味的报刊、文章的讽刺和批判。

邦八股罪状很多，以上不过是举其大者。可以看出，邦八股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文风所具有的严肃的科学的战斗的态度，生动、鲜明、尖锐的战斗风格，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是一种剥削阶级的极恶劣极腐朽的文风。它不但窒息革命精神，束缚人的思想，而且传布反革命作风，损害党的威信，破坏党和群众的关系。

早在一九七二年批林歪风的时候，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提出歪风文风的问题。毛主席亲自批转了商业部的两篇好

而外的调查报告，要《人民日报》发表，指出：文章太长，谁看？必须要改一下。周总理接着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从歪顿文风入手，搞好批林歪风，肃清“林毒”。“四人邦”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对周总理的指示，更是明目张胆地反对。现在真相大白，“四人邦”同林彪一样，都是以“左”的和最最革命的词句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都是拒绝唯物论，坚持唯心论，都是厌恶辩证法，酷爱形而上学，推行的都是一条极右路线。他们同林彪是一家兄弟，一丘之貉，怎么舍得去肃清“林毒”呢？他们的邦八股中不就包藏着林彪的大舅污垢吗？

彻底肃清邦八股的流毒，歪顿好文风，必须作极大的努力。我们应当为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发扬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而斗争。

四、改进文风的几点意见

这里，我们主要讲的是，在写作实践上如何贯彻毛主席关于文风的指示。

（一）写得外些，粹粹些

林彪这个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派，为了制造反革命舆论，炮制的黑文章，像烂婆娘的果脚，又长又臭。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离题万里，冗长罗索。举个例子来看吧，什么“最大的一次，而不是同他们一样大，更不是比他们小，也不是稍微大一点，而是极大，最大。”象这样的腐烂发霉的文风，毛主席把它们作为党八股的头条罪状加以痛斥。

恩格斯在抨击政治骗子杜林的文风时，说杜林的书处

处是冗长的废话，充满着最浅薄的陈辞滥调和庸人的学究气。可见，长、臭、空、滥是中外骗子共同的文风。

我们有的同志也染上了说废话的毛病。他们往往把一件活生生的事淹没在滔滔不绝的废话中。斯大林同志曾经叙述过他与“一个不可救药的爱说废话的人”的一次谈话——

我问：你们的播种工作怎样了？

他答：斯大林同志，你问播种工作吗？我们已经动员起来了。（笑声。）

我问：那末结果怎样？

他答：我们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笑声。）

我问：那末以后又怎么样呢？

他答：斯大林同志，我们有了转变，马上就会有转变。（笑声。）

我问：究竟怎样了？

他答：我们那里有了一些进步。（笑声。）

我问：可是你们的播种工作究竟怎样了？

他答：斯大林同志，我们的播种工作暂时还毫无头绪。（哈哈大笑。）

这就是爱说废话的人的百目。

（引自《列宁主义问题》第570页）

毛主席历来反对长而空的东西，指示我们应当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外些，写得精粹些。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延安召开的反对党八股大会，原先就叫压缩大会。毛主席在讲话中特别称赞斯大林同志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发表的那篇重要演说，说它只有我们《解放日报》一篇社论那样长。毛主席的著作是我们学习的典范。他一九五六年四月写的《论十

大关系》讲了十个问题，每个问题都十分重要，但都只用了千把字就把问题转辟地讲清楚了，语言生动，寓意深刻，句句是真理。他一九七〇年发表的《五·二〇声明》，概括了国际形势，指出了形势发凡的新特点，讲了反帝斗争的历史经验，讲了哲学，把迢立国际范围的反对美帝统一战线这个问题阐述得十分透彻，是反帝斗争的伟大纲领。可是，它只有千把字。真是外而转粹的文章的典范。

说话和写文章要做到言简忌明、外而转粹，这首先要要求我们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这样，我们才能一语中的，而不至于半天都罗索不转。比如，关于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在一切历史唯心论者的笔下，总是显得纷繁错综，喋喋不休，而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笔下，在毛主席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几笔就阐述明白了。

言简忌明的文风，需要我们有高度的概括能力。为此，我们应当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认真读书中，提炼思想。要对实际生活作反复的研究，去粗取转，去伪存真。对所论事情要有确切的了解。要训练头脑，使之具有条理和中心，从复杂纷乱的事情中理出内下之间的联系。经常练习写导语，写一点外诗，作书刊内容提要，这些都可以提高概括能力。发言或一篇文章的头几句话，常常标志着作者的概括能力。毛主席讲，要善于打起旗帜。标题和头几句话往往就是旗帜。标题的文字要具有高度概括性。

为着简外，就必须在写文章时搞清楚阅读对象和写作目的。人家疼的你老在那里罗索，就显得多余了。与写作目的无关的话，一律禁绝。对写作目的和阅读对象缺乏明确的认识，或者根本就没有考虑过，爱好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的

自我表现和卖弄，有哗众取宠之心而无实事求是之忌，也是一些文章冗长的原因。

这里有一个群众观点的问题。在写作时，要尊重群众，相仪群众。要把重点放在启发读者思考问题上，而不赘述结论，要给人留下思考的余地。要抓住要害，不必百百俱到，“假使做事要百百顾到，那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正对‘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与致命的重伤。”不要发空泛的长篇议论，而注重把人和事表现得淋漓酣畅。抒怀，要有真传实志。

在拿笔之前，应有个提纲或“腹稿”，以免仗笔写来，洋洋洒洒，不知所云。漂亮的空话，娓娓动听的陈辞滥调，均应删去。要反映出群众的呼声，使文章充满旺盛的生机。

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这是鲁迅先生告诫我们的。鲁迅先生的杂文，内容丰实，波澜起伏，跌宕多姿，析理深透，又都很简洁有力，其中有很宝贵的经验，我们应当细心揣摩和学习。

（二）充分说理和具体分析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批评指出：“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文章，就是这种恶劣而浅薄的货色的最典型的表现。他们的讲话或文章中，充满着恐吓、谩骂、攻击、武断、谣言和诡辩。

我们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要观点和材料统一。

有时看到一些文章，观点是对的，但使人感到作者的这个观点是囿囿的孤立的，那是因为作者没有论证自己提出的结论，没有借助有说服力的论据、事实、数字等说明自己的观点。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随便地举出一些事实，接着便说“由此可见”、“显然看出”，结论就来了。这样的结论未免武断，当然也缺乏说服力。因为读者还“由此未见”或“显然看不出”事实和论点之间的必然的逻辑关联。列宁说：“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精确的统计数字和从各个方面，特别是通过阶级分析所举的事实，常常是避免武断的好方法。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昌》用了许多经过分析的统计数字。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那些中伤农民运动的流言所依据的“事实”，作了精辟的阶级分析，那些流言就彻底破产了。

从全部总和、从联系中去论证事实和论证观点的方法，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背景法”。从比较中、从联系中去阐明自己的观点，把问题提到具体的背景上，就会有说服力。有时我们觉得说清楚了，要讲的都讲了，可人家仍感到不理解，就是因为没有背景，没有衬托，没有比较。比如，看一个公社的生产怎样，就要将它的产量和去年或历史上某一年的产量比，还要和其他的公社比。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上去比较，如与外国相比较。总之，进行纵的比较和横的比较。还要有绝对数、相对数，百分比。这样，论证就充分了。这个方法，毛主席叫“古今中外法”。

为了充分说理，在革命大批判中，要注意将政治的批判和理论的批判结合起来，既揭露其理论上的荒谬性，又点穿